

前 言

欲為大學，必有大師。

2022 年五四青年節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好的學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有一支優秀教師隊伍。對教師來說，想把學生培養成甚麼樣的人，自己首先就應該成為甚麼樣的人。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們的教師既精通專業知識、做好『經師』，又涵養德行、成為『人師』，努力做精於『傳道授業解惑』的『經師』和『人師』的統一者。教育是一門『仁而愛人』的事業，有愛才有責任。廣大教師要嚴愛相濟、潤己澤人，以人格魅力呵護學生心靈，以學術造詣開啟學生智慧，把自己的溫暖和情感傾注到每一個學生身上，讓每一個學生都健康成長，讓每一個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老師應該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的自覺，不斷提高自身道德修養，以模範行為影響和帶動學生，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大先生，成為被社會尊重的楷模，成為世人效法的榜樣。」

殷殷期待，諄諄囑託。

從陝北公學到華北聯大，從華北大學到中國人民大學，88 年來，一批又一批大先生匯聚這所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新型正規大學，共同奏出與共和國同向同行同頻共振的時代交響樂。

這裏名師輩出，俊彥雲集。已故名師大家吳玉章、成仿吾、范文瀾、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何洛、胡華、尚鉞、吳景超、李景漢、

龐景仁、石峻、繆朗山、李秀林、徐禾、塞風、許孟雄、孟氧、佟柔、戴世光、劉錚、查瑞傳、苗力田、吳大琨、蕭前、林文益、閻達五、閻金鐸、方生、高鴻業、鍾契夫、吳寶康、彭明、彥奇、曾憲義、宋濤、薩師煊、王傳綸、李文海、許崇德、劉佩弦、周誠、王思治、方立天、鄭杭生、夏甄陶、周升業、羅國傑、藍鴻文、甘惜分、黃順基、莊福齡、孫國華、李占祥、高放、衛興華、周新城、胡乃武、陳共、趙中孚等，儘管他們的身影已經漸漸遠去，但人大人會永遠銘記他們在各自學科領域中的卓著成就，會永遠銘記他們為學校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奠定的堅實基礎。

歲月更迭，光陰荏苒，任書卷泛黃、年華老去，卻道「未染是初心」。88年，我們「與黨和國家同呼吸共命運」的底氣未嘗更改，「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決心不敢稍怠，一代又一代的大先生，為「人民共和國的建設者」的搖籃、人文社會科學高等教育的重鎮、馬克思主義教學與研究的高地的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卓越貢獻。這是一群大先生傳道授業的崇高追求，這是一所大學立德樹人的使命擔當。

如今的人大校園，仍有如鄒滄萍、黃達、戴逸、方漢奇、李震中、許征帆、何沁、高銘暄、胡鈞、嚴瑞珍、趙履寬、陳先達等一批心繫教育、情牽學子的老一輩學術大師，以旺盛的學術生命力、永不停歇的創新精神和孜孜以求的治學態度，引領學科建設屹立於學術高原之巔。

「為學當如金字塔，要能博大要能高。」這是百歲老人，我國人口學、老年學的學科開拓者鄒滄萍教授「治學報國」的不懈追求。

「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這是「人民教育家」、新中國刑法學的主要奠基者和開拓者高銘暄教授培養「人民共和國的建設者」的堅定志向。

「有限的人生，溶入力的洪流會化作永恆！」這是「全國最美教師」

陳先達教授「始終奮進在時代前列」的勇毅擔當。

.....

舉辦一級崗位教授聘任及榮退儀式，開展「吳玉章師德師風大講堂」「優秀教師教學經驗分享」，組織學校師德先進集體和師德標兵評選，一直以來，中國人民大學致力於塑造培育新時代大先生的良好氛圍，持續加強榜樣選樹宣傳力度，講好「人師」故事，傳播「人師」聲音。

旗幟高展，使命高懸。

今年，我們在《中國人民大學》報歷史文稿的基礎上，兼顧《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日報》《中國高等教育》等國內主流媒體的相關稿件，選取其中部分作品結集成冊，出版《大先生——中國人民大學學術大家訪談錄》一書，回顧大先生們負笈求學、追求真理、勤於治學、教書育人的人生歷程，以期弘揚老一輩人大學人的治學品格和道德風範，展現這所以「人民」為名的大學 88 載傳承不絕的精神薪火。

我們堅信，有大先生們甘為人梯、循循善誘，有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教師成為育人事業的中流砥柱，我們一定能建成扎根中國大地、面向國際學術前沿、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獨樹一幟」的世界頂尖大學，為國家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人類文明進步做出重要貢獻。

願學術之火永恆，願思想之樹常青！

目 錄

鄔滄萍	穿越百年滄桑 丹心終繫家國……………	007
黃 達	探浩渺金融天地 傾一生求真求實 ……	031
戴 逸	履霜堅冰至 涓水匯洪流 ……………	051
方漢奇	尋新聞之史脈 揚大家之正氣……………	077
李震中	經世立學 矢志報國 ……………	101
許征帆	胸懷家國之大義 求索主義之真理 ……	117
何 沁	躬身黨史數十載 潛心著述著真章 ……	145
高銘暄	鮐背之年仍胸懷「國之大者」 ……………	167
胡 鈞	筆下千鈞 昂藏萬仞 ……………	195
嚴瑞珍	踏遍千山萬水 心寄田壟之間……………	217
趙履寬	拓勞人之學 育桃李芬芳 ……………	237
陳先達	馬克思主義哲學信仰播種人 ……………	257
參考文獻	……………	279
後 記	……………	282

鄔滄萍

穿越百年滄桑
丹心終繫家國



【先生小傳】

鄔滄萍（1922年9月—2023年6月），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我國人口學、老年學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我國最早一批人口學碩士、博士生導師之一。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學報》（英文版）編委，《人口研究》雜誌名譽主編。曾任中國老年學學會會長，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北京市人口學會名譽會長，北京市老齡科研中心名譽主任，中國老齡協會專家組組長，首都醫科大學老年醫學系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國際人口研究機構聯合會常務理事，國際計生聯亞太地區常務理事，國際老年學會亞大分會常務理事，聯合國馬耳他老齡研究所兼職教授。曾任第五屆北京市政協委員，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市政府參事，民盟中央常委和北京市委副主委，民盟中央顧問，《群言》雜誌顧問。

鄔滄萍 1941—1946 年就讀並畢業於嶺南大學經濟學系，1948—1951 年在美國紐約大學攻讀並獲 MBA 學位，同時在哥倫比亞大學選修統計學作為第二專業。1951 年回國後，先後在中國人民大學等校教授統計學、人口學和老年學並從事研究工作，1971 年起開始專門從事人口學教學和研究。

20 世紀 70 年代，在人口學沉寂 20 多年後，鄔滄萍等率先意識到人口問題將長期成為中國最突出、最特殊的問題。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新中國人口學的第一篇理論文章《人口非控制不行》，先後參加創辦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口研究所、人口學系、老年學研究所、《人口研究》雜誌等，並擔任《人口與經濟》《老齡科學研究》的

學術顧問，為沉寂多年的中國人口學的恢復、重建奠定了重要基礎。1979年，鄔滄萍與其他中國人口學者組成代表團，到聯合國總部、美國、法國、英國、泰國等考察一個月，其後又多次到歐美發達國家和亞非拉國家參加會議、講學、考察，對世界人口形勢有了較為深刻的了解，也結識了當時國際上知名的人口學、老年學的專家、學者和主管官員。1980年後，鄔滄萍作為聯合國與中國合作成立的中國人口學培訓中心的中方負責人，負責培訓人口學學員、邀請國內外專家講學、選派年輕學者出國學習人口學、進行南南合作、培訓朝鮮和越南年輕學者。

20世紀80年代初第三次人口普查結束後，在我國離進入老齡化社會還有一段距離時，鄔滄萍就已經預測到人口老齡化將成為我國的必然趨勢，並為人口老齡化進行了理論、輿論、制度建設、人才培養等各方面的準備。1983年，他開始指導我國最早的老年學方向的碩士生、博士生，建立了我國老年學的知識體系，給這門學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礎。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我國老年學學會成立；中國人民大學老年學專業建立——這是我國高校第一個老年學專業，開創了我國老年學教育史上的里程碑。

鄔滄萍完成了大量具有奠基性和創造性的學術成果，先後出版著作和教材約30種，如《人口統計學》《人口學辭典》《社會老年學》《老年學概論》《中國人口老齡化：變化與挑戰》等；公開發表論文、文章200餘篇，其中發表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紅旗》《中國社會科學》《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的有30多篇。學術論文和學術著作曾十幾次榮獲國家級、省部級獎項。

由於在學術研究、人才培養方面貢獻卓越，鄔滄萍榮獲了多項學術獎勵，如獲第二屆中華人口獎（科學獎）、北京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2000年獲中國老教授科教興國貢獻獎。

2014 年，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評選的「最美老有所為人物」中，鄔滄萍是唯一來自高校的獲獎者。頒獎詞稱他「研學唯精，一心存報國家志；桑榆未晚，眾口爭誇矍鑠翁」。2016 年，他在清華大學「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級公務員清華大學國家事務研習課程」中，講授關於人口、老齡和「三農」問題，獲得香港公務員處頒發的杏壇獎，還獲得清華大學授課 100 期榮譽獎。他還曾獲得中華人口學會終身榮譽會員獎和中國老年保健協會突出貢獻獎。

退休後的鄔滄萍除了繼續帶博士生，仍堅持從事人口學和老年學研究，獨著和主編的《人口學學科體系研究》《老年學概論》《人口、資源、環境關係史》《鄔滄萍自選集》《從人口學到老年學》《老齡社會與和諧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老年價值論》等著作，先後獲得國家級、省部級獎項，其中兩本還作為國家重點圖書進行推廣，曾在國外圖書展覽展出；2017 年還曾應邀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解讀「十三五」老齡規劃。

他有一顆赤子之心，青年時代遠赴重洋輾轉求學，又衝破重重阻礙跨海歸來，回到祖國的懷抱。

他一生醉心於治學，是新中國人口學、老年學的拓荒牛，積幾十年專精鑽研，成為中國「生老之學」的一代宗師。

他傾注心血潤桃李，是我國人口學最早的研究生導師，以 85 歲高齡退休後仍堅持指導博士研究生。

他是「最美老有所為人物」，從戰「疫」直播首秀到新生入學雲課堂，他永遠與時代合拍，永遠用自己的生命之光傳遞無窮的正能量。

壬寅虎年金秋，他將迎來百歲華誕。承載了一個世紀的風雨洗禮，愈加閃耀的是對祖國的熱愛，是對學術的摯愛，是對學生的慈愛，是對生命的大愛。他，就是鄔滄萍。

愛國情結萌發自動盪年代

1922 年，鄔滄萍出生於廣東番禺。南村鄔氏世居嶺南，漸成望族，家境殷實，族中不乏讀書人，涵育了重視教育的家風。母親潘氏也家境不凡。優渥的生活條件不僅使他的雙親成為百年前的留日學生，更使鄔滄萍成為一個在母腹中就陪伴父母「留洋」的孩子。他的童年衣食無憂，並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機會。

鄔滄萍年幼時，中國正處於國共兩黨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時期，席捲華夏大地的革命浪潮在廣東尤為激烈，從軍隊到學校，處處都是高喊口號、大聲唱歌的火熱情景。以至於現在年近百歲的鄔滄萍仍能清楚地唱出那首難忘的歌：「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奮鬥！」當時的鄔滄萍年紀雖小，卻

歌聲嘹亮。

鄔滄萍在小學就讀時，學校環境優美、學習氛圍濃厚，他也勤奮刻苦、成績優異。然而，這樣平靜而幸福的生活卻被「九一八」事變擊得粉碎。有一天，鄔滄萍剛步入校門，校園裏的警鐘就沉重地響起。全校師生集合到大操場，校長緩步走上講台，滿臉悲痛、聲音嗚咽地說，「我們的東三省丟了！」一陣沉默後，操場上響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日本人滾出東三省」的憤怒呼號。二年級的鄔滄萍跟着老師同學們一塊兒喊起了口號，心中第一次燃起了對佔領祖國領土的日本侵略者的憤怒與仇恨。

鄔滄萍回憶說：「那是我第一次受到的愛國主義教育，也是從那時起我心中埋下了愛國主義情結。」從那以後，作為小學生的鄔滄萍就加入了抗日宣傳活動。他和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在課餘時間裏走上街頭，有時是賣花集資，有時是做募捐活動。鄔滄萍積極參與每一次活動，因為老師告訴他們，要為抗日戰士捐款買飛機，去抗擊日本侵略者。年幼時期樸素的愛國主義在鄔滄萍心中萌發，改變了他的人生選擇，多年後促使他放棄美國的優厚待遇，回到了當時貧窮落後的祖國，為祖國建設效力。

中學時代，鄔滄萍憑藉優異成績進入廣東最負盛名、被譽為全省中學精英的廣雅中學。廣雅中學為洋務派代表人物張之洞創辦，環境幽雅，歷史悠久，學風嚴格，理念超前。鄔滄萍很快適應了寄宿制的管理模式，依舊努力學習，成績優異。鄔滄萍極為重視這段求學時光，「廣雅中學不僅給了我最高質的中學教育，更與時代共同哺育了我，在我的心中深深埋下了愛國的種子」。不僅如此，學校重視體育，文體活動豐富，鄔滄萍也變得熱愛鍛煉並因此受益匪淺。他能經受十幾年戰爭生活的考驗，直至高齡仍能堅持工作，和在中學時期養成的鍛煉習慣密不可分。

在廣雅中學的日子裏，鄔滄萍最難忘的是自己曾經歷的抗日愛國學生運動。廣雅中學爆發學生罷課、遊行示威時，鄔滄萍親身感受到了國人日益高漲的抗日愛國情懷。對各種進步書刊的閱讀，是鄔滄萍最早接受的進步愛國教育。在校內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中，大家一起學習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哲學著作，也閱讀《生活》《新生》《大眾生活》等傳播先進思想的著作和雜誌，此外，他們還能夠通過香港的報紙知曉被國民黨封鎖的國內外消息。這些進步書籍和報刊，使鄔滄萍更加清醒地認清國內政治形勢，也激發了他更強烈的愛國熱情。

1935年，「一二·九」救亡學生運動在北京爆發。一個月後，廣雅中學開始了抗日救亡宣傳的示威遊行，遊行結束後，學生們開始全校罷課，儘管校門外圍滿了持槍的軍警，師生心中燃燒的抗日怒火卻無法熄滅。鄔滄萍和老師同學們把個人的命運同國家的命運聯結在一起，高唱着革命歌曲堅持宣傳抗日。從閱讀進步書刊到親歷遊行罷課，再到跟隨學校遷到順德，少年鄔滄萍在國家的生死存亡之際，把澎湃的愛國情懷厚植心中。

為了祖國放棄「金飯碗」去喝「洋墨水」

戰火在中國大地不斷蔓延，父母雙親也相繼病逝，鄔滄萍和弟弟在短短幾年間過着顛沛流離的生活，但他從來沒有放棄學習，最終順利考取嶺南大學經濟學系，弟弟鄔法潛也考上了中山大學電機系電信專業。每每憶起那段艱苦歲月，鄔滄萍都不免感慨，「我最慶幸的是，雖然父母去世得早，但是我始終沒有失去上學的機會，沒有中斷學習」。

由於戰爭，考入嶺南大學的鄔滄萍依然經歷了長途跋涉等異常艱

苦的搬遷逃亡，歷經五年，大學學業才輾轉完成。樂觀的鄔滄萍曾說起一段逸事：香港淪陷後，嶺南大學停止在香港辦學，準備遷往粵北的新校址。鄔滄萍和幾個同學為了前往新校址，必須穿過封鎖線。在那片「三不管」地帶，時常有地痞流氓專門勒索過路人錢財，鄔滄萍模仿有名地痞的語氣寫信讓人放行，又送了些禮物，竟然安全通過。從廣州到香港，再到曲江和東江梅縣，直到抗戰勝利返回廣州，鄔滄萍跟隨嶺南大學師生幾經輾轉，艱難完成學業。

1946年，抗戰勝利後的第二年，鄔滄萍從嶺南大學畢業。剛剛結束戰爭的國民黨政府為早日恢復經濟建設，面向社會進行全國性公開考試招募人才。鄔滄萍得知這一信息後立即報名參加當時國民政府考試院組織的特種高級財務人員考試，並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在通過三場考試後，鄔滄萍最終選擇了海關。當時，海關待遇好，特別是他被分配到的香港九龍海關，工資比大學教授還要高，在當時被認為是「金飯碗」，幾乎一輩子不會失業。

進入海關後，鄔滄萍被送到上海開始為期一年的學習。由於成績優異，他僅用半年就結束全部學業並很快獲准前往九龍赴職。在上海學習的半年，他與後來的妻子李雅書相識、相知、相愛，收穫了令他終生難忘的愛情。24歲的鄔滄萍年輕帥氣、學習優秀，是海關考試取得第一名的佼佼者；25歲的李雅書端莊文雅、聰慧好學，是拿到金鑰匙獎的燕大高才生。兩個同樣出色的年輕人一見如故，一起暢談工作、學習，暢談國家的未來，也暢談他們的理想。李雅書的姐姐和姐夫已在美國僑居多年，所以他們的交談，總是離不了出國留學的話題。

在半個多世紀前的舊中國，出國留學無疑是許多大學畢業生的最高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夢想。1948年，為了開闊眼界，更為了學成後能夠為改變國家貧困落後的面貌貢獻力量，鄔滄萍和李雅書毅然放棄了待遇優厚的工作，雙雙踏上了赴美留學的道路。到了美國後，他

們在紐約的教堂舉辦了婚禮。隨後，鄔滄萍在紐約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學位，李雅書則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歷史學碩士學位。雖然離開了故土，但早已植根在鄔滄萍心中的愛國情懷卻絲毫沒有減弱。他仍然關心遠在大洋彼岸的祖國，一有時間就會和來美國後新結識的來自西南聯大、中央大學的學生一起交流討論來自國內的信息。這些青年學生和鄔滄萍一樣熱愛祖國，思想進步。在香港的親戚還經常寄來《華商報》，鄔滄萍自己也繼續訂閱香港出版的《大公報》和《文匯報》。這些具有愛國主義思想，主張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又敢於揭露真相、闡明觀點的進步報紙，讓鄔滄萍在學習之餘也能夠多方面閱讀到關於祖國政治局勢等的各類消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消息傳來，鄔滄萍和幾個要好的進步同學異常興奮。他們立刻決定搞一個歡慶活動，以表示對新中國誕生的慶祝。經過一番籌備，一場在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的紐約大學國際留學生樓禮堂裏的小型慶祝活動順利舉辦，滿含着這些進步學生對剛剛成立的社會主義祖國的深切熱愛與嚮往之情。

1950年，鄔滄萍不僅順利拿到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而且修完了博士學位的全部課程，與此同時，他還在哥倫比亞大學拿下統計學專業的學位。鄔滄萍意識到，MBA課程內容對於當時新中國的計劃經濟派不上用場，而統計學則是計劃經濟的基礎。在一心報效祖國的情結下，鄔滄萍努力學習了統計學知識，也正是這次跨學科的選擇，成為他回國後開展人口學研究的「起源」。在當時的美國，人口學也仍然是一個鮮為人知的學科，學者們更熱衷於研究國民收入。參與了國民收入比較研究課題的鄔滄萍通過數據驚訝地認識到了舊中國的極度貧窮和國家之間貧富差距的巨大，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促使他響應黨的號召，回國參加革命和新中國的建設。

萬里不移歸國心

鄔滄萍時常說，「中國人回國還需要理由嗎？留在美國才需要找藉口」。在他心中，回國從來不是一個疑問句，而是一個感歎句。但在無法逃避的現實面前，這一選擇依然面臨着嚴峻考驗，亦「經歷了激烈的思想鬥爭」。萬里回國路上，鄔滄萍與妻子最先面對的是國民黨和美國政府對中國留學生返回大陸的極力阻攔。除此之外，來自家庭和生活環境的壓力、待遇優厚的工作、在美親人的真心挽留等等，都是橫亙在回國之路上的障礙，但他們最終選擇遵循深埋於心中的愛國情結。到如今縱使已經時隔一個甲子，回憶起當初的選擇，鄔滄萍仍然感到無比自豪。

1951年8月，鄔滄萍夫妻帶着年僅一歲的兒子天方登上了「富蘭克林號」輪船，途經日本抵達香港，又從香港乘船到達深圳後最終回到廣州。到達廣州後，近30名海外歸來的學子受到了隆重歡迎。一週後，他們離開廣州，經由上海奔赴北京。

回到祖國後，鄔滄萍被教育部分配到了北京輔仁大學經濟系教授統計學。正如他所設想的，工商管理學在當時的中國完全沒有用武之地，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的第二專業統計學反而派上了用場，此外英文也被認為沒有用，他們又重新學習俄文。

一年後，中央人民政府仿照蘇聯的教育模式，對全國舊有高等學校的院系進行全盤調整，輔仁大學經濟系與北大、清華、燕大各財經專業的教師一起被併入剛成立不久的中央財經學院，於是鄔滄萍也隨之去了中央財經學院。1953年，中央又做出撤銷中央財經學院的決定，並將其中部分師資併入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隨之來到中國人民大學。鄔滄萍對此次調動十分高興與激動，他回憶起這段經歷時說：

「中國人民大學作為從解放區走出來的一所新型社會主義正規大學，聲名顯赫，我在美國時就有所耳聞。新型的大學裏面樣樣都是新的、革命的，吸收的教師都是革命的、進步的青年和知識分子，很多都是解放區的學生。我們這種從國外回來的，真是想都不敢想去中國人民大學。那個年代中國人民大學地位很高，當時大學的排位是『人北清師』。所以我回來一年後調入人大，真是喜出望外……」為此，他「一直誠惶誠恐，努力工作，力求完善自己」。

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在香港讀書時經常閱讀中國民主同盟《華商報》的鄔滄萍，就十分贊同民盟堅持國共合作、堅持進步、反對分裂的一貫原則。因此回國後，他在輔仁大學黨組織的推薦下加入了「民盟」。來到人民大學後，鄔滄萍一直嚴格要求自己，教學上兢兢業業，思想上積極要求進步。他意識到自己不是共產黨人也不是革命者，想要搞好教學工作，就必須思想進步，一心跟黨走。

祖國熱火朝天的社會主義建設給了鄔滄萍無窮的工作動力。為提高思想覺悟，他一邊任教，一邊開始如飢似渴地參加學校組織的理論學習，而且依然如上學時一樣勤奮認真。在學校開設的馬列主義夜大學四門基礎理論課中，他的學習成績一直領跑在前。「印象最深的是吳玉章校長親自給我們講黨課，即便是在三九天，也是照講不誤。我們都是穿着一件棉襖，每個人帶一個小馬扎，在文化廣場露天聽報告，很冷的，一聽就是一兩個小時。」通過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學習，鄔滄萍的思想覺悟和理論認識有了很大提高，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有了質的提升，課程中學習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哲學基礎，也為鄔滄萍的教學工作提供了「望遠鏡」和「顯微鏡」，讓他能夠既站得高看得遠又對小問題看得更加深刻。

與新中國人口學共同走過的歲月

1953 年，中央政府決定開始對全國進行第一次人口普查，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一件大事，翔實的人口普查資料也將為國民經濟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提供重要依據。一年後數據公佈，大家都沒有想到居然超過 6 億，大大超過原來普遍認為的 4.75 億的估計數。這個數字足足高出估計數四分之一，一直焦急等待這次普查結果的知識界學術界頓時掀起熱議。很多學者分別在各種場合提出了中國人口過多、必須要節制的問題。當時馬寅初提出的「控制人口數量，提高人口質量」的正確主張，為我國在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推行計劃生育政策提供了理論基礎。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系的年輕教師，同時也是這次人口普查工作的直接參與者，鄒滄萍由此開啟了對人口問題的思考。

1957 年，鄒滄萍成為中國人民大學第一批下鄉勞動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西山南平莊村整整幹了一年農活後，才回到人大繼續從事教學。也是在這個時期，鄒滄萍編寫完成了他的第一本著作《商業統計學》。後來，鄒滄萍又去了條件更為艱苦的湖南湘潭易俗河，也曾與學校的其他教師一起被下放到江西省餘江縣的劉家站「五七」幹校勞動。提起那一段經歷，鄒滄萍十分坦然，「實踐也證明經過勞動鍛煉的這些人，後來都是比較堅定、任勞任怨的。他們大部分人思想作風都艱苦樸素，愛國主義立場堅定。通過勞動，我慢慢就覺得經歷農民生活對我從事社會科學有好處」。

1971 年，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復，需要履行會員義務參與各類問題的討論。在人口問題引起全世界重視的背景下，人口大國中國受邀參與在 1974 年召開的第三屆世界人口會議。為了適應新的國際形勢，新的研究人口問題的班子迅速籌備起來。一直從事統計學

專業教學，並且精通英語的鄔滄萍，「求之不得」地被吸收進人口學研究小組。因為早在美國留學期間，他就萌發了研究中國人口的願望。他在美國就曾想過，中國並不像過去所說的那樣「地大物博」，「人口多是提高人均收入的一個大障礙，必須改變」。加入人口學研究小組，是一心要改變祖國落後面貌的鄔滄萍在我國人口學研究的道路上邁開的第一步。

1974年，鄔滄萍在人口學研究的道路上又一次做了堅定的選擇。這一年，國務院文教辦公室牽頭，聯合北京市委和計劃生育辦公室，共同建議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基礎上成立一個專門研究人口的常設機構。在當時的形勢下，這個人口學研究機構的成立，無疑表明一度受到忽視的人口學重新得到恢復和正名。因為當時人們對馬寅初人口論遭受的批判記憶猶新，所以願意繼續從事人口學研究的教師並不多，甚至可以說是極少的。鄔滄萍在這個時刻義無反顧地留下了，他有信心亦有決心搞好中國的人口學研究，也因此成為中國最早從事現代人口學研究者之一，到現在，也是我國從事人口研究時間最長的人。

雖然鄔滄萍義無反顧地留在了初建的人口研究所，但無論是當時中國國內的國情，還是國際上人口學研究發展的具體情況，都在客觀上為剛剛成立的人口研究所工作的開展帶來很多困難：專業從事人口學的學者屈指可數，留下的著作寥寥無幾；缺乏現代的理論方法和人口數據；難以與國際接軌，學術環境堪憂。建所初期，鄔滄萍和劉錚、戴世光、查瑞傳等學者們共同克服困難，開始了研究工作。他們首先從外國人口學研究現狀、人口思想史、人口發展史、人口統計學技術方法等入手，翻譯英文、俄文等人口資料文獻，也編著了很多有關人口學研究的著作，為沒有理論和方法的中國人口學研究做了很多基础性工作。隨着《世界人口統計簡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統計指標基本知識》等著作的問世，鄔滄萍等學者可以說是在廢墟之上建立起了中

國人口學的第一層基座。在鄒滄萍的建議下，人口研究所還創辦了我國第一個人口學學術期刊《人口研究》。該期刊的出版，無疑更積極地促進了我國剛剛起步的人口學研究隊伍的發展和壯大。這是中華大地第一批從事人口學研究的工作者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他們為中國人口學研究最早的奉獻。

中國人口學研究真正邁開步伐快速前進，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1979年，我國與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合作，組成了一個人口學家代表團出國考察。這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個出國考察訪問的人口學家代表團，也是鄒滄萍自1951年歸國近30年後第一次走出國門進行考察訪問。代表團中有三人都是研究人口學的黨外學者，這讓鄒滄萍十分感慨，他覺得「親身體會到黨的改革開放，看到黨對知識分子的信任，從心底裏感覺和黨的感情又拉近了一步」。1981年，中國人口學家第一次出席在馬尼拉召開的國際人口學會會議，並隨代表團對聯合國總部及美、英、法、泰等幾個國家的各類人口學機構進行考察訪問，讓鄒滄萍親眼見到了我國人口學研究同國外人口學研究的差距。訪問美國時，他也見到了闊別近30年、在美國過着富裕生活的幾位親友。不同境遇的對比使他百感交集，更堅定了改變祖國貧窮落後面貌的決心。

1979年5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鄒滄萍與劉錚合寫的一篇文章《人口非控制不行》。自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以及其他學者的人口論述在1957年被批判後，時隔20多年沒有人敢公開發表關於人口的論述。這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衝破人口問題「禁區」之時，《人民日報》刊登的第一篇關於人口學理論的文章，也是鄒滄萍和劉錚本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撰寫完成的，亦可說是鄒滄萍在我國人口學研究的道路上邁出的有力一步，這篇文章被形容「為之後新時期人口科學的蓬勃發展吹響了號角」。

1980年，《人口研究》刊登了由鄔滄萍、劉錚和林富德聯合發表的《對控制我國人口增長的五點建議》。這是三位作者對北京、河北、江蘇等地的工廠和農村進行深入調查後，用手搖計算器，按照人口統計學年齡移算法，根據當時取得的人口年齡結構和分年齡死亡率，推算出我國人口發展趨勢及預測結果，最後由鄔滄萍起草完成的一份研究報告。在當時既沒有電腦，也沒有現如今那麼多人口預測軟件的條件下，要預測出我國人口發展趨勢，可以想見是何等艱難不易。因此，這是自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學者關於人口問題提出的第一份研究報告，不僅具有積極的時代意義，更浸滿了鄔滄萍和那一代學者的辛勤汗水。

在1982年中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後，鄔滄萍即敏銳地發現中國人口老齡化的苗頭已經出現，並出現出生性別比失衡問題，於是他着手進行調查研究，並在科研項目「中國人口問題研究」中承擔了對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的分析研究，終於在我國第三次人口普查後準備召開國際會議之前，完成了又一篇力作《中國人口性別比的研究》。在20世紀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長達十幾年的時間裏，一直致力於我國人口學研究的鄔滄萍，不僅先行開始對中國人口發展戰略進行思考，更明確提出人口零增長的戰略構想，同時還為推行中國的計劃生育工作做了大量的研究和宣傳，為人口學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與老年學結下不解之緣

在開拓、創建和發展中國人口學的同時，鄔滄萍也因較早預見中國人口的老齡化而成為最早創建中國老年學的人口學家。他的學生、

北京大學教授穆光宗稱他「在老年學領域……迄今為止，在國內被公認為是最有影響的老年學家，也是這方面事業最重要的開拓者之一」。

自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後，雖然此後連續數次全國人口普查工作鄔滄萍均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但讓他印象最深的是 1982 年進行的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為了完成這次普查工作，600 萬名調查員被動員起來，甚至超過有些國家全國人口的總和。技術設備也從用筆記錄、用算盤計算「升級」為使用現代化的電子計算機，有了很大改進，調查項目也增加了很多。第二年公佈的數據顯示，中國已經有 10 億人口了。經過對人口結構等數據進行分析，鄔滄萍率先意識到中國老齡化問題已經初露端倪，他在不久後的國際學術會議上分享了自己的觀點，贏得了與會學者的普遍讚賞。此後，他就逐漸將研究重點放在人口老齡化上。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中國人口學研究的重點是控制人口，很多人覺得人口老齡化在中國不會出現，也有人認為這個時期在中國開展老年學研究對計劃生育工作大局不利，因而鄔滄萍對人口老齡化的認識讓當時的有些學者不以為然。但鄔滄萍仍然堅持對老年學的研究，並力所能及做了許多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準備工作。在人口學研究領域中早早預見到我國人口老齡化，並結合當時的中國國情為人口老齡化做好準備工作，這是鄔滄萍為創立中國老年學邁開的第一步，也是他對開創中國老年學的貢獻，不由讓今天的我們對鄔滄萍的超前意識和對老年學的辛勤付出更加欽佩。

1984 年，鄔滄萍在指導研究生利用中國 1982 年人口普查數據率先研究老齡化問題之後，又撰寫完成了自己第一篇有關人口老齡化的文章《老齡問題和我們的對策》，並在《人民日報》發表。1987 年，鄔滄萍又完成了《論老年學的形成、研究對象和科學性質》一文，發表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這是一直積極投身開創中國老年學的鄔滄萍為

進一步推動老年學研究的又一貢獻。

這之後，鄒滄萍又先後發表了《創建有中國特點的老年學》《老年學在我國是一門有現實需要的科學》《人口老齡化與我國老年學研究的開展》等多篇論文。這些論文的完成和發表，既為中國剛剛興起的老年學開創了道路，也代表了鄒滄萍潛心研究中國老年學取得的初步成果。而他在《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發表的《論老年學的形成、研究對象和科學性質》及《創建有中國特點的老年學》更是得到了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先生的讚揚。

為中國編寫一部有關老年學研究的書是鄒滄萍埋藏已久的心願，進入 20 世紀 90 年代，鄒滄萍對老年學的研究更加廣泛和深入。1999 年 10 月，浸滿了鄒滄萍致力於中國老年學辛勤汗水和治學心得的《社會老年學》出版了。這部書是鄒滄萍和他的學生經過幾年的時間共同研究社會老年學的成果，也是他們為發展中國老年學做出的卓越貢獻。如今《社會老年學》出版已有 23 個年頭，仍在中國老年學研究領域閃爍着耀眼的光芒。

鄒滄萍在擔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時就提出提案要成立中國老年學學會。1986 年經過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批准，中國老年學學會正式成立，並加入國際老年學學會。鄒滄萍在第一屆大會上被選為副會長，在第二屆大會上被選為會長，任職長達 10 年之久。後來每一屆都被選為名譽會長。在擔任會長期間，他組織了許多有影響力的學術活動，擔任名譽會長以後，繼續參加中國老年學學會的年會活動，並在學會成立 20 周年大會上獲得了老年學終生貢獻獎。

此外，鄒滄萍關於「健康老齡化」「積極老齡化」「未富先老」「老齡社會與和諧社會」「存在決定健康長壽」等一系列學術思考和實踐指導已成為我國制定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中國戰略的重要參考。

為國育才初心不改

如果說科學研究是鄔滄萍的畢生志趣，那麼在中國人民大學 70 餘載教書育人的歷程，則每每令他深感欣慰與自豪。讓他尤其引以為傲的是，在他的悉心指導和陪伴下，已經有一大批人口學和老年學的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成長起來，他們奮戰在教學和科研第一線，奮戰在為人民服務的第一線，取得了可喜可賀的成績。每當看到學生們成長起來並取得成績時，鄔滄萍的心中就會湧起一陣陣抑制不住的激動，深深以自己的學生為傲，「我的學生早已超過了我們這些曾經指導過他們的老師，真的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成為我國人口學和老年學領域的領軍人物和帶頭人」。看着學生們學有所成，鄔滄萍就像一個園丁看着他親手培育的秧苗不斷茁壯成長，終於開花、結果，心中充滿欣慰與激動。

2005 年退休後，「退而不休」的鄔滄萍更加忙碌。除了帶碩士生博士生外，他還受聘於清華大學對外文化教育交流中心，擔任清華大學客座教授。一直到 2016 年 9 月，第 105 期授課結束，94 歲的鄔滄萍才向清華大學提出辭請。20 多年來，鄔滄萍出色完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高級公務員國家事務研習課程班講授人口問題、老齡問題和「三農」問題的教學任務。正式退休後，依然為老年學拚搏奉獻的鄔滄萍碩果纍纍。

從 20 世紀 70 年代走進中國人口學，開拓創建中國人口學到首創中國老年學，到以 95 歲高齡主編完成 60 萬字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依然在為中國老年學辛勤澆灌的鄔滄萍，至今已滿百歲，是人人景仰、學養深厚、品德高尚的壽星。

談起長壽的秘訣，鄔滄萍表示「仁者壽，勤者壽，智者壽，樂者

壽」，這是他百年人生的凝練和真實寫照。歷經千般種種，奉獻大半生智慧，如今，這位精神矍鑠的百歲老人仍然活躍在人口學和老年學界，正如學生在賀詞中所寫：「百歲華髮少年夢，萬世桃李下成蹊。」

（執筆人：陳驪驪、葉晴）

【側記】

學術與人生路上的導師

孫鵬娟

回想起來，到今年 2022 年我認識鄔老師已有 25 年了。第一次見到鄔老師是 1997 年 10 月在北京召開的國際人口科學研究聯盟 (IUSSP) 第 23 屆國際人口科學大會上。他淵博的學識和謙和的態度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於是 2000 年我堅定地報考了他的博士研究生，並有幸順利以各門單科以及總分第一的成績考上人大博士，成為鄔老師的學生。

更幸運的是，在隨後的學術與人生道路上，我總能時時得到鄔老師的無私指導和教誨，於是我也得以更全面地了解為何他既能夠做到在治學之路上持之不懈、碩果累累，又能夠在耄耋之年依然健康矍鑠。

鄔老師對於學術有着常人難以企及的熱情。我跟隨鄔老師學習時他已經 78 歲了，但幾乎每次與他的交流無論甚麼主題，總會在三五句話之後轉移到他的學術觀點上。他通過大量閱讀、關注時事、積極參與會議來保持對現實問題的敏銳觀察。在他還住在人大林園時，我記得他用來存放書稿目錄卡片的櫃子就是他家客廳裏最醒目的傢具，卡片上寫滿筆記和出處。如今最新出版的學術著作他也會仔細閱讀，上面用各種顏色的筆做了很多批註。

他對學術的熱愛也對我產生了很深的影響。我在讀博士期間跟隨鄔老師進行過生育政策、老齡化、孝道、生活質量等幾個主題的研究。每一個研究問題都在他積極而又嚴謹的推動下得以順利完成。

我們在《求是》《浙江大學學報》《群言》等有影響力的雜誌發表了幾篇論文。跟着鄔老師學習是一件既「省心」又「不省心」的事。說「省心」是因為他對任何研究都會下很大功夫查文獻、反覆揣摩、不斷修改，例如我們要撰寫一篇論文時，到我手裏的「提綱」常常是寫得滿滿的好幾頁，而我順着他的思路再進一步做些補充，文章和論證就基本成型了。鄔老師甚至還會標註出來要查找的某些資料，所以跟他一起寫文章真的是比較輕鬆的一件事！但「不省心」體現在對於每一個主題、每一篇文章、每一章書稿他都會不滿足於原有的想法，而是反覆斟酌思考，而且只要一有思路就會打電話給我，滔滔不絕地談他的新想法，以至於與鄔老師討論論文的「電話粥」常常長達一個多小時。但正是因為他如此濃厚的學術熱情才推動我這樣一個當時的老年學新人在踏入這個學科後也致力其中，並作為自己終生矢志不渝的事業。

鄔老師是一個非常崇尚理論創新且有着開闊學術視野的智者。他總是力圖從現象看到本質，再深入淺出地用最簡練甚至是通俗的語言表達出來，而如果沒有進行過深入的理論思考與艱難求證的人是難以體會其中的艱辛的。記得在我的博士論文選題時，一開始我想選的是當時比較熱門而我自己又容易把握的題目，但鄔老師已經看到了我國老齡問題發展的前景和老齡研究更深層次的問題，他提出研究中國老年人的生活質量是更有意義和價值的。正是在他有遠見的指導下，我通過對老年人生活質量理論、指標體系的初步研究得以對老年學、老齡問題有了一個比較系統的探索，至今對於我的教學和研究都是非常有益的。

他時常教導我說，「中國的老齡問題特別需要理論指導，但理論創新是最難的，加上很多人不夠重視，使得不少研究總是停留在很多重複性或表面性的結論上，缺乏有深度和廣度的理論思想」。我想，

作為一個已經卓有建樹的學術大家，他依然憂心於學科的發展問題，如果沒有強烈的學術使命感和對老年學、人口學深深的熱愛是不會反覆強調這些無關個人得失的問題的。至今我在研究中遇到難題時心裏總是不會慌張，因為身邊有這樣一位學識淵博而又樂於分享的導師可以求助，何其幸焉！

勤奮必須是描述鄔老師的關鍵詞之一。他的勤奮嚴謹有目共睹，不勝枚舉。無論大至學術報告、書稿論文撰寫還是小至一場社區講座，他都親力親為做大量的工作。記得在他的指導下我們曾做過一個生育政策與老齡化方面的研究，其中有一個法國生育率數據他覺得有疑義，為了弄清這個難以發現的小問題，他連夜查找了很多歷史資料來糾正。如今我自己也擔任了博士生、碩士生導師，在工作中我也時常提醒自己要學習老師這種勤奮、嚴謹的精神。

在他的世紀人生中，經歷了不少曲折坎坷，但他總是用積極樂觀的心態來應對。我想也許正是對生活始終懷有飽滿的熱情和豁達向上的態度，他才能若干年如一日地堅持鍛煉、堅持營養、堅持學習、堅持做研究。作為一個長壽而又健康的老人，我觀察到他的長壽秘訣其實很簡單，但他能夠在每天的生活中把這些健康原則貫徹始終，才能最終達到全面健康的狀態。鄔老師把健康長壽歸結為「仁者壽，勤者壽，智者壽，樂者壽」，最近兩年更進一步上升到哲學層面上的「存在決定健康長壽」。而在這些真知灼見的背後我看到的是他對生活自始至終的熱愛和積極去體現自我價值所做的努力。

2003年我博士畢業時，非常榮幸地在鄔老師、杜鵬老師等的鼓勵支持下，繼續留在人民大學從事老年學、人口學的教學研究。這些年來，鄔老師在學術思想上對我的啟迪和指導始終沒有中斷過。一旦他有新的思想或看法，常常興奮地與我分享，有時還把手稿或請紅芳幫助錄入的打印稿寄送給我，讓我得以不斷學習前沿理論知識。

在鄔老師的信任、鼓勵和鞭策下，我參與了他主編的《老年學概論》（第二版和第三版）、《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老齡社會與和諧社會》、《老年價值論》等書稿部分篇章的撰寫工作。在撰寫過程中，老師總是預先就考慮到可能遇到的問題，並及時給予我思想認識上的啟示。對於不同的學術觀點，他一方面會直言不諱地提出他的意見，另一方面也會包容而耐心地聽取我們的想法，因此在他的指導下從事研究，既充分感受到他的豐富思想和廣博視野，也得以領略他兼容並蓄、有容乃大的學術精神。

在生活中，鄔老師還是一位積極樂觀、睿智豁達、慈祥寬和的長者。我的就業、安家、結婚、生子、出國等這些人生中的重要事情都得到了他的關心和幫助，他還用他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睿智的思想給我指導，讓我更有信心和能力去面對生活中的困難。我和我的家人都已經在心底裏把他當成了最敬重、最慈愛的長輩和親人。

這些年來，我是如此幸運地能夠跟隨鄔老師學習、成長，不僅向他學習專業知識，更深深體會到他作為一位學術大家所展現出的常人難以企及的治學精神、思想境界和人生智慧，使我感到我在工作和生活中也要把這些知識和精神財富傳揚下去，行為世範，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大先生。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

黃達

探浩渺金融天地
傾一生求真求實



【先生小傳】

黃達(1925年2月—2023年2月)，天津人。中國人民大學一級崗位教授，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新中國金融學科主要奠基人，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顧問、中國金融學會名譽會長等職。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及應用經濟學科評議組召集人。

黃達於1946年5月進入華北聯合大學法政學院財經系學習，後於1946年深秋轉入該校政治學院研究室攻讀研究生，1951年至1983年夏，歷任中國人民大學財政系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系主任等職，1983年夏起擔任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1991年底至1994年6月，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

黃達是新中國金融學教材與課程體系的主要引領者。從新中國第一部金融學教材《資本主義國家的貨幣流通與信用》(1957年版)，到突破蘇聯框架的《貨幣信用學》(上冊)(1959年版)，再到《社會主義財政金融問題》(1981年版)，最後到《貨幣銀行學》(1992年版、1999年版)和《金融學》(2003年版、2009年版)，他編著的不同版本的金融學教材一直引領新中國金融學教材和課程體系建設的方向。

黃達是新中國經濟學領域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系統論證者。他的代表作《財政信貸綜合平衡導論》(1984年版)，標誌着財政信貸綜合平衡理論體系得到系統論證。

黃達數十年如一日，在完善金融學科體系、豐富金融學科內容、

促進中國金融學科發展方面不遺餘力。世紀之交，針對經濟金融全球化對中國金融學科建設提出的新挑戰，他在國內率先提出兼容宏觀金融與微觀金融的「大金融」學科建設的整體設想。他始終堅守在中國金融教育的第一線。1984年，教育部與美國福特基金會合作共建「中美經濟學教育交流項目」，作為項目中方主席的黃達開始致力於推動中國經濟學教育交流與人才培養的國際化進程。多年來，他不懈地致力於為中國金融教育走向世界建設通途。

黃達是新中國金融理論的積極實踐者與金融決策的積極參與者。早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9年，他便開始正面討論當時尚屬「禁區」的通貨膨脹問題，開改革開放以來國內討論該問題之先河。一直以來，他積極為國家金融規劃和決策、金融事業創新和發展建言獻策，多有成就。

黃達的科學研究與教學成果集中體現於1999年、2005年、2010年以及2014年先後出版的《黃達文集》（上、下卷）、《黃達文集（續）》、《黃達文集（再續）》（上、下卷）、《黃達文集（三續）》以及2005年出版的《黃達書集》（6卷本）。他曾先後獲得第二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1986）、首屆「中國金融學科終身成就獎」（2011）、第六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2013）以及第三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並多次獲得國家級優秀科研（教學）成果獎和優秀教材獎。

在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史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70 多年創業史上，高等教育都佔據特殊重要的地位、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縱觀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歷史，無疑是星光熠熠、大師雲集的。而若要梳理新中國金融學科的奠基、創新、發展脈絡，廣續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統，黃達這個名字無可迴避。

他是一位學人，生於中華民族歷盡屈辱、生死存亡之時，求學於火熱革命年代，學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際。他奉獻所學，應着祖國的需要著書立說，潛心於學術研究，結緣貨幣銀行學 70 餘載，從中國的經濟現實出發，在探索中奠定了新中國金融學科和金融理論的重要基石。

他亦是一位師者，醉心於教書育人，固守三尺講台，在黨和國家為社會主義建設而進行探索和實踐的過程中，始終耕耘在高等教育領域，全身心地引導着學生和他一起參與到了了解、欣賞、介紹中國貨幣銀行學景觀的旅程中，為國家建設培養了一代又一代專業人才。

他與學術結緣的 70 餘載，亦是在關注現實、求真求實中不斷創新的 70 餘載，他被經濟學界譽為新中國金融學教材與課程體系的主要奠基者與引領者、新中國經濟學領域綜合平衡理論體系的系統論證者、新中國金融學科體系的主要設計者、新中國金融教育事業的主要開拓者、新中國金融理論的積極實踐者與金融決策的積極參與者。

迎着光明前進 踏着波濤弄潮

1925 年 2 月，黃達出生在天津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受到身為工程師的父親影響，他自幼的求學理想也是學習工科，對於經濟學則並不